

<<中东史-610-2000年-上下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东史-610-2000年-上下册>>

13位ISBN编号：9787201062334

10位ISBN编号：7201062336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者：哈全安

页数：97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中东”一词源于西方殖民扩张的时代背景，原本具有“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痕迹和政治色彩。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英属印度殖民当局将介于所谓“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与英属印度殖民地之间的伊朗以及与其毗邻的中亚和波斯湾沿岸称作中东，用于区别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近东和包括东亚诸国在内的远东。

1900年，“中东”一词正式出现在英国的官方文件中，进而为西方列强普遍采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退出历史舞台，所谓近东与中东之间的政治界限不复存在，中东逐渐成为泛指西亚北非诸多区域的地缘政治学称谓，包括埃及、肥沃的新月地带、阿拉伯半岛在内的阿拉伯世界以及土耳其和伊朗则是中东的核心所在。

中东地区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高原、山脉与大河流域构成基本的地貌形态。

高原、山脉与大河流域错综相间的地貌分布；导致截然不同的经济活动与生活方式长期并存。

高原和山区大都地广人稀，适合牧养牲畜的经济活动。

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和尼罗河水流量充沛，河水流经之处形成人口分布相对稠密的定居社会。

游牧群体与定居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贯穿着中东历史的进程。

安纳托利亚高原位于中东的北部，地处小亚细亚半岛，亦称小亚细亚高原，为黑海、爱琴海和地中海所环绕，地势自东向西倾斜。

“安纳托利亚”一词似乎源于希腊语，本意为“日出之处”，特指希腊人眼中的日出之处即爱琴海东岸。

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平均海拔900米，地表崎岖，峡谷纵横，气候干燥，降雨匮乏，季节变化明显，农业与畜牧业错综分布。

庞廷山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北侧，长约1000公里，呈东西走向；庞廷山与黑海之间的狭长区域，地势低平，森林茂密。

陶鲁斯山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南侧，亦呈东西走向，长约1200公里，构成小亚细亚半岛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天然分界线。

内容概要

伴随着公元七世纪的曙光，伊斯兰教诞生在亚洲西南部的沙漠瀚海，阿拉伯人悄然崛起于仿佛被喧嚣的文明社会所遗忘的角落，进而走出贫瘠荒凉的家園，作为崭新的统治民族登上中东的历史舞台。阿拉伯人创立的庞大帝国，囊括了两起夫西洋、东至帕米尔高原、北迄高加索、南达阿拉伯海的辽阔土地。

伊斯兰教的传播惊醒了不信者的酣梦，波斯人、突厥人、柏柏尔人和库尔德人相继加入穆斯林的行列。哈里发统治下的国家在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中经历了六百年跌宕起伏的岁月，王朝更迭，浩荡长歌，悲怆动人。

终于有一天，从东方涌来的蒙古铁骑踏碎了巴格达哈里发励精图治的最后梦想，享尽风流的帝国湮灭于弹指之间，阿拔斯王朝曾经的蔚盛文风和滚滚翰墨从此成为远去的往事。

中东文明的传统并没有因为蒙古铁骑而销声匿迹，中东历史的长河依然在静静地流淌。在蒙古铁骑浩劫的残垣断壁之上，奥斯曼土耳其人异军突起，在小亚细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攻城掠地，夺取拜占庭帝国的千年古都君士坦丁堡，降服两起马格里布、东至扎格罗斯山西麓的阿拉伯人。奥斯曼帝国继阿拉伯帝国之后再度雄踞亚欧非大陆的中央地带，传承着先知穆罕默德点燃的信仰火种和阿拉伯帝国的文明遗产。

自十五世纪开始，基督教世界迅速崛起，历史的天平随之经历由东向西的巨大倾斜。缘起于欧洲大西洋沿岸的现代化浪潮冲击着“三洲五海”的世界，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曾经统治的辽阔疆域沦为西方列强蚕食和瓜分的“东方遗产”。

进入二十世纪，诸多的主权国家兴起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古老的土地迎来了现代的文明，中东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篇章。

人们或许仍然守候着千百年的梦想，却不得不面对动荡和变革的现实。

在麦加，悠扬的驼铃声在起伏的汽笛中湮灭。

在开罗，鳞次栉比的高楼陪伴着日升月落。

在安卡拉，竞选的传单漫天飞舞。

在德黑兰，攒动的人群倾听着世界的声音。

在迪拜，行色匆匆的过客或许牵动着华尔街敏感的神经。

生活在中东这个神奇的土地上的人们，畅想着美好的未来，从不曾放弃希望。

作者简介

哈全安，吉林省吉林市人，1961年生，回族。

1978-1991年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曾在伊朗德黑兰大学文学院进修，主要著作包括《古典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封建形态研究》和《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西亚非洲》、《史学集刊》、《东北师大学报》和《南开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市政协常委、中东学会理事，入选教育部首批“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主讲“世界上古中古史”入选国家精品课程，获天津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书籍目录

上 前言 第一章 伊斯兰文明的诞生 一、阿拉伯人的古代历史 二、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 三、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 第二章 哈里发国家的变迁 一、麦地那哈里发国家 二、倭马亚王朝 三、阿拔斯王朝 第三章 哈里发时代中东的经济与社会 一、经济制度与经济生活 二、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 第四章 哈里发时代中东的宗教与文化 一、伊斯兰教的发展 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成就 第五章 奥斯曼帝国的兴衰 一、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二、奥斯曼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 三、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与宪政运动 四、传统经济社会秩序的解体 五、从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到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第六章 波斯的复兴与伊朗的现代化进程 一、波斯的复兴 二、恺伽王朝时代伊朗传统秩序的衰落 三、礼萨汗时代伊朗的现代化实践 四、巴列维国王的统治与伊朗现代化的长足进步 五、伊斯兰革命与伊朗的现代化走向下 第七章 埃及的现代化进程 一、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启动 二、自由主义时代埃及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秩序 三、纳赛尔主义的现代化模式 四、萨达特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现代化的历史走向 第八章 新月地带诸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伊拉克 二、叙利亚 三、黎巴嫩 四、约旦 五、巴勒斯坦 六、以色列 第九章 阿拉伯半岛诸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沙特阿拉伯 二、海湾诸国 三、也门 第十章 土耳其共和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土耳其共和国的兴起与凯末尔主义的现代化实践 二、战后土耳其经济与社会的进步 三、战后土耳其的政党政治与政治变迁结束语 伊斯兰教诞生以来中东历史的回顾与思考本书引用的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奈伯特人扼守希贾兹商路的北端，曾经是米奈—赛伯邑人经营转运贸易的重要伙伴。

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的香料和其他各种物产大都在皮特拉卸货，再由奈伯特人贩运到地中海东岸各地。

在广泛从事过境贸易的基础之上，奈伯特人逐渐崛起，成为地中海东岸介于定居区域与游牧群体之间的重要政治力量。

公元前169年的铭文中，首次提到奈伯特人的国王哈里萨斯。

公元前1世纪，奈伯特人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并且一度击退罗马军队的攻击。

公元初年，奈伯特人的疆域包括叙利亚南部和希贾兹北部的诸多地区。

至帕尔米拉兴起以后，奈伯特人的势力日趋衰落。

公元105年，罗马皇帝图拉真吞并所谓的“阿拉伯山岩”，奈伯特人的国家沦为罗马帝国的行省，皮特拉亦从文献记载中消失。

公元1世纪以后，帕尔米拉犹如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出现在茫茫无际的叙利亚沙漠之中。

“帕尔米拉”在希腊文中意为枣椰之城，阿拉伯人称之为塔德木尔，阿拉伯语中意为废墟。

帕尔米拉原是北方阿拉伯人生活的绿洲，公元前1100年的亚述铭文曾经提及该地。

波斯安息王朝兴起以后，两河流域成为沟通地中海世界与波斯湾沿岸的主要贸易通道。

帕尔米拉位于大马士革与幼发拉底河之间，是联结叙利亚与两河流域的必经之路，占据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加之具有充足的水源，成为横贯沙漠的贸易枢纽和商贾辐辏的富庶之邦。

罗马帝国时期，帕尔米拉承认罗马皇帝的宗主权，并且一度以罗马帝国的名义统治叙利亚沙漠和阿拉伯半岛北部。

260年，罗马皇帝瓦列里安在与波斯军队作战中兵败被俘，帕尔米拉国王伍得奈斯起兵援救，击溃波斯军队，攻至波斯首都泰西封城下。

262年，罗马皇帝加列那斯赐封伍得奈斯为统治东方的副王，帕尔米拉的势力达到顶峰。

267年，可能由于罗马人的策划，伍得奈斯在霍姆斯遭到暗杀。

伍得奈斯死后，其妻齐诺比亚自称东方皇后，立幼子韦海卜·拉特为“凯撒·奥古斯都”，起兵反抗罗马帝国，攻占埃及和小亚细亚。

齐诺比亚发动的攻势咄咄逼人，罗马帝国朝野震动。

272年，罗马皇帝奥列里安御驾亲征，击败帕尔米拉人。

随后，奥列里安将帕尔米拉夷为平地，昙花一现的沙漠明珠从此被人遗忘。

后记

教俗合一的国家形态伊斯兰传统文明形成于中世纪的特定社会环境，个体生产、自然经济、超经济的强制和广泛的依附状态以及思想的束缚构成伊斯兰传统文明的历史基础，伊斯兰教的诞生和阿拉伯人从野蛮向文明的演进历程则是深刻影响伊斯兰传统文明的重要因素。

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半岛处于原始社会的野蛮状态，信仰的转变和伊斯兰教的诞生揭开了阿拉伯人建立国家和步入文明时代的帷幕，而公共权力由宗教生活向世俗领域的延伸则是这一过程的核心内容。

《古兰经》屡屡强调安拉至上和顺从使者的信仰原则，进而阐述国家权力的政治理论，将尚且鲜为人知的崭新政治概念引入阿拉伯半岛氏族部落的社会体系。

先知穆罕默德作为安拉的使者而凌驾于氏族部落之上，不仅负有传布启示的神圣使命，而且行使驾驭社会的世俗权力。

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立的温麦，无疑是《古兰经》所阐述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理念得以逐步实践的逻辑结果。

从宗教意义的顺从到世俗行为的约束，标志着国家权力通过温麦的形式始露端倪。

教俗合一的温麦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原生形态，构成伊斯兰传统文明的基本政治框架。

在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诸国，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长期并立，教会与国家自成体系，分庭抗礼。

至于华夏文明及其周边区域，世俗权力极度膨胀，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贯穿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

相比之下，教权与俗权的密切结合构成伊斯兰世界传统政治制度的突出现象，宗教与政治长期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则是伊斯兰传统文明区别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以及华夏文明的显著特征。

根据传统伊斯兰教的政治理论，宗教是国家的基础，温麦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外在形式起源于安拉的意志。

温麦兼有国家与教会的双重功能，教会与国家则被穆斯林视作同一概念。

超越宗教界限和纯粹世俗范畴的政治行为与温麦的原则大相径庭，并无存在的空间。

捍卫伊斯兰教法的神圣地位是伊斯兰国家的目的，维护穆斯林的宗教利益则是伊斯兰国家至高无上的政治准则。

在传统伊斯兰世界教俗合一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宗教学说与政治理论错综交织；宗教学说构成政治理论的前提，政治理论则体现为宗教学说的延伸和补充。

与此同时，政治群体往往体现为宗教派别，政治对抗通常采取教派运动的形式，政治斗争的首要方式便是信仰的指责。

形式各异的教派运动皆有相应的政治基础、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反映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政治利益的矛盾对抗。

传统伊斯兰教认为，安拉是温麦的主宰，是世人的君王，沙里亚则是安拉意志的体现和安拉规定的法度，是先于国家的秩序和尽善尽美的制度，芸芸众生只有遵循沙里亚的义务，绝无更改沙里亚的权力，即使哈里发亦不可随意立法，而必须服从沙里亚的约束。

另一方面，伊斯兰世界的传统理论强调君权神授和君权至上的政治原则，强调君主的统治权力和臣民的从属地位；统治者是其臣民的牧人，他将为自己的行为和臣民的行为对安拉负责，而选择统治者和惩罚统治者的权力只属于安拉。

至于臣民享有的权利，在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理论中则缺乏明确的阐述。

所谓臣民终止顺从统治者和反抗统治者的相关规定往往只是理论上的虚构和道义上的制约，现实意义微乎其微，而忠君思想则是传统伊斯兰政治理论的实质所在。

麦地那哈里发时代，古老的阿拉伯半岛刚刚告别野蛮的秩序而初入文明的社会，独尊安拉的共同信仰尚未完全取代阿拉伯人的血缘联系，氏族部落的传统势力根深蒂固，原始民主制的残余和权位继承的非世袭传统深刻地影响着穆斯林的政治生活。

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共和政体，财产占有状况的相对平等、浓厚的部族色彩和强烈的民主倾向则是麦地那哈里发时代的鲜明特征。

麦地那哈里发时代末期，穆斯林内部的贫富差距日渐扩大，社会对立日趋加剧，共和政体陷入深刻的

危机。

穆阿威叶即位后，在伊斯兰世界首开哈里发家族世袭的先河，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制度随之由共和制转变为君主制。

阿拔斯王朝建立后，沿袭倭马亚时代君主制的政治传统，历任哈里发皆系阿拔斯家族的成员。

阿拔斯哈里发国家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阿拔斯哈里发的统治权力被认为是来自安拉的赐予。

哈里发每逢朝廷典礼和宗教节日皆身着据称是先知穆罕默德遗物的斗篷，并在宫中聘用宗教学者依据经训阐述的原则制定统治政策和进行神学宣传，以示其权力的合法与地位的神圣。

哈里发不仅自居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世界的捍卫者，而且被视作全体穆斯林的宗教领袖，集教俗权力于一身，凌驾于社会之上，处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对于哈里发的任何冒犯，都被视作宗教意义的亵渎。

继哈里发国家之后统治中东长达6个世纪之久的奥斯曼帝国采用君主制政体，苏丹的权位继承遵循奥斯曼家族世袭的政治原则。

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凌驾于臣民之上，象征着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沿袭哈里发时代教俗合一的历史传统，政治生活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自诩为“信士的长官”，俨然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继承人，兼有世俗与宗教的最高权力。

保卫伊斯兰世界的疆域、统率穆斯林对基督教世界发动圣战和维护伊斯兰教法的神圣地位，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首要职责。

奥斯曼帝国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哈奈菲派教法构成官方法律制度的基础。

沙里亚位于奥斯曼帝国法律体系的顶点，规定穆斯林的个人行为以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相互关系，直至规定社会秩序和国家制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侵犯的神圣性。

萨法维王朝亦强调伊斯兰教的神权原则，尊奉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实行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

萨法维王朝的国王自称伊玛目家族的后裔和“安拉在大地的影子”，兼有什叶派宗教领袖与世俗君主的双重权力。

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官方宗教学说赋予萨法维国王以神圣的外衣，成为萨法维王朝驾驭社会和统治民众的重要工具。

……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世俗化一词源于欧洲基督教世界，特指宗教生活的非政治化，强调宗教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分离原则。

世俗化并非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而是与相应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

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世界，教会与国家长期并存，宗教生活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处于二元状态，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可谓最具影响的政治势力和传统秩序的集中体现。

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旨在否定教会权威和摆脱教廷控制的宗教改革构成欧洲基督教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世俗化进程集中体现世俗与宗教之间的权力争夺，包含民族解放和民众解放的明显倾向，与现代化的进程呈同步发展的趋势。

所谓的世俗化并非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特有现象，亦曾存在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

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缘起于西方冲击的历史时代，具有明显的西化倾向，其主要举措包括引进西方的世俗法律，兴办西方模式的世俗教育，关闭宗教法庭，取缔宗教学校，剥夺宗教地产，削弱宗教势力的自主地位。

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长期伴随着中东诸国的现代化进程。

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相比，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并非严格遵循宗教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分离原则，而是强调国家和政府对于教界的绝对控制，表现为宗教机构的官僚化和宗教思想的官方化。

世俗化改革往往与极权政治的膨胀表现为同步的状态，包含权力模式重新构筑的政治倾向，系官方强化控制民众社会进而建立极权政治的必要举措，其实质在于极权政治自世俗领域向宗教领域的延伸。

官僚化的教界和宗教机构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并未脱离政治领域和丧失政治功能，而是成为极权政治的御用工具。

国家意志与民众意志的差异，往往表现为官方宗教学说与民众宗教思想的对立和冲突。

官方化的宗教学说极力维护现存政治秩序的合法地位，无异于麻痹民众的精神鸦片。通常认为，宗教改革是基督教世界的特有现象，基督教通过宗教改革而由传统的意识形态转变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至于伊斯兰教则未曾经历过宗教改革，系传统范畴的保守意识形态，是制约伊斯兰世界社会进步的负面因素，而所谓“宗教对抗国家”则是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众所周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意识的相应变化。

诸多宗教尽管根源于特定的社会现实，却非处于静止的状态，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尤其是在不同的时代伴随着性质各异的思想变革过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阶级社会的诸多宗教作为阶级对抗的产物和体现，具有双重的社会功能。

一方面，阶级社会的宗教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和压迫民众的精神枷锁，是“人民的鸦片”。

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为民众反抗现实的苦难提供神圣的外衣，进而构成社会革命的外在形式。

至于理性通过神性的扭曲形式而得以体现和发扬，在历史长河中亦非鲜见。

自19世纪开始，伊斯兰世界逐渐步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温麦作为教俗合一的国家形态不复存在，世俗民族国家相继建立，世俗化风行一时。

极权政治作为“发展的独裁模式”无疑是伊斯兰世界诸多新兴世俗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而排斥民众的政治参与构成世俗民族国家之极权政治的明显特征。

在世俗民族国家之极权政治的历史条件下，独裁政府长期操纵议会选举，排斥世俗政党的政治参与，直至取缔非官方的世俗政党，禁止民众的自由结社，世俗反对派政治势力往往缺乏必要的立足之处，宗教几乎是民众反抗的仅存空间，宗教的狂热则是民众发泄不满和寄托希望的首要形式，清真寺随之取代议会而成为反抗世俗极权政治的主要据点。

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并非传统政治特有的和唯一的历史模式，而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亦非从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转变的必要条件和必然过程，所谓的世俗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并非表现为同步的趋势。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政治层面的核心内容无疑是民主化的历史运动，其实质在于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

民主化的政治进程取决于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而不是取决于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

至于所谓的世俗化，其特定内涵在于宗教生活的非政治化，并非政治现代化的必要组成部分。

综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世俗政治在诸多地区的传统社会构成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

换言之，世俗政治并非现代社会的特有现象，神权政治亦非仅仅属于传统社会。

强调现代化进程与世俗化进程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进而将世俗化视作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用世俗化的程度衡量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实属令人费解。

进入20世纪，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诸多主权国家的建立和民族矛盾的缓解，民主化运动在中东伊斯兰世界日趋高涨。

与此同时，现代伊斯兰主义在中东伊斯兰世界悄然崛起，构成下层民众广泛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挑战极权政治的重要外在形式。

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思想不同于教界传统的政治理论。

传统教界作为伊斯兰世界传统社会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其与世俗政权之间尽管不无矛盾，却大都局限于传统秩序的框架，无意倡导民主政治。

传统教界的政治理论集中体现传统社会的客观物质环境，强调传统秩序的合法地位，是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舆论工具。

相比之下，现代伊斯兰主义强调《古兰经》和“圣训”的基本原则以及早期伊斯兰教的历史实践，崇尚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和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社会秩序，强调真正的伊斯兰教并非远离政治的个人信仰和僵化的神学理论，而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众利益的体现，其核心内容在于借助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而倡导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原则，进而构成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和挑战世俗极权政治的意识形态。

现代伊斯兰主义貌似复古，实为借助于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强调公众参与和公民权利，抨击世俗色彩的极权政治，其基本思想已与教界传统的政治理论相去甚远，无疑属于现代宗教政治理论的范畴，颇具革命的倾向。

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根源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裂变和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集中体现世俗极权政治的条件下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抗争。

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理论，可谓“被压迫生灵的叹息”与被剥夺权利之下层民众的政治宣言。

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滥觞，标志着崭新的政治文化借助于宗教的神圣外衣在伊斯兰世界初露端倪。

现代伊斯兰主义蕴涵着民众政治动员的巨大潜力，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实质在于借助宗教的形式否定传统政治模式进而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实现民众的权力分享。

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理念与现代民主政治并非截然对立，两者之间亦非存在必然的悖论。

所谓宗教与世俗的对抗，在中东诸国并非“现代化的难题”，亦非体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是包含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激烈抗争的明显倾向。

将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视作传统的回归抑或现代化进程的逆向运动即所谓反现代化的看法，显然存在商榷的余地。

统治模式决定民众的反抗模式，特定的政治环境塑造着相应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

中东诸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环境不尽相同，政治民主化进程参差不齐，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实践亦表现各异。

南亚和埃及是现代伊斯兰主义的重要发源地。

早在1926年，印度的穆斯林学者阿布·阿拉·毛杜迪首倡现代伊斯兰主义的革命原则和暴力倾向，宣称伊斯兰教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的实践，其宗旨是摧毁当今世界的社会秩序而代之以崭新的社会秩序。

继赛义德·毛杜迪之后，埃及人哈桑·班纳和赛义德·库特布相继阐述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思想，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政治实践构成埃及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外在形式。

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基础是徘徊于政治舞台边缘地带的下层民众，支持者遍及城市和乡村。

埃及自70年代起经历国家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的演进，贫富分化明显加剧，下层民众的不满情绪日趋高涨，伊斯兰教反对贫富不均和倡导社会平等的信仰原则随之广泛传播。

宗教政治挑战世俗政治抑或所谓的宗教对抗国家，成为萨达特时代埃及政治的突出现象。

以安拉的统治取代“法老”的统治以及实践《古兰经》的信仰原则和重建先知时代的神权秩序，则是穆斯林兄弟会挑战现存政治秩序的基本纲领。

穆斯林兄弟会的著名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之颇具革命性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理论，无疑是纳赛尔当政期间极权政治和高压政策的产物。

后纳赛尔时代的埃及，民主化进程逐渐启动，极权政治出现衰落的征兆，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立场随之日趋温和，议会竞选的积极参与成为穆斯林兄弟会之主流势力角逐政坛的首要方式。

在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极权政治的膨胀和绝对主义的高压政策导致现代伊斯兰主义之极端和激烈的政治倾向。

阿里·沙里亚蒂和霍梅尼阐述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宗教政治思想，可谓巴列维当政期间的伊朗之极权政治和高压政策的逻辑结果。

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和所谓的“头巾取代王冠”，埋葬了伊朗君主独裁的传统政治制度，进而为伊朗民主政治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自80年代开始，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土耳其趋于高涨，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

然而，土耳其长期实行多党制的政治体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权力角逐在土耳其并未表现为尖锐的对抗和激烈的冲突，尤其是没有形成否定现存政治秩序和重建伊斯兰政体的激进政治纲领。

政党政治的活跃、议会政治的完善和选举政治的成熟，决定了土耳其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温和色彩。

宗教政党在土耳其的合法政治活动，以及宗教政党与世俗政党的广泛合作，构成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明显特征。

<<中东史-610-2000年-上下册>>

编辑推荐

《中东史610-2000(套装上下册)》是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